

# 第一章

## 导 论

这是一部关于原籍而不是种族、宗教或国籍怎样逐步界定中国条件下的族群身份的历史。这种情况犹如非洲裔美国人和奇卡纳、波兰人、意大利人的身份在美国一向被视为族群一样确定无疑。本书所写的苏北人，其家庭源自江苏省长江以北地区，该书涉及中国的原籍族群的社会建构和社会含义。

自 19 世纪晚期以后很长一段时间，作为居住在上海的一名苏北人，就意味着他是穷人。多半是由于洪水、饥荒或家乡的战争而逃难的难民，苏北人在上海所从事的职业是最不赚钱、最差强人意的营生。他们占了不熟练劳工队伍的大多数——黄包车夫、码头工人、建筑工人、拉粪车工、运垃圾工、理发匠、澡堂侍者。大多数苏北人居住在该市边缘的贫民窟里，用芦苇麦秸、纸板和能够找到的随便什么废料搭盖棚屋。

部分地是由于穷，苏北人成为偏见和歧视的对象。他们穿的红红绿绿的褂子让人发笑，嘴里一股大蒜味，人皆趋避，操着一口苏北方言受人取笑。苏北文化在清代中期被认为是高雅隽永的象征，到 19 世纪晚期渐渐被视为低级鄙俗。从 20 世纪早期起，称呼某人为苏北猪猡就意味着这个人即使实际并非来自苏北也是穷困、无知、肮脏和鄙俗的。

大多数苏北人生活的聚居区被认为是粗野的地区，父母告诫他们的孩子不要进去。大学毕业生最怕日后被分配到苏北居民区里的学校去教书。最后，谁也不希望同苏北人结婚。年轻人，包括苏北家庭出身的年轻人出去找对象，几乎总是指明对象不要是苏北人。

对苏北人的偏见如此冥顽不化，以致已经移居出去的上海人也把它传输出去，加以再创作，赋予新的含义。例如，一位在解放前上海家境殷实的老年妇女解释道，每当她在纽约乘地铁想要抱怨波多黎各人或非洲裔美国人的行为时，就把他们说成是苏北人，这位妇女在纽约生活了好多年。她相信她用这种方式可以避免被人说是种族主义者而受到攻击的可能性。

对苏北人的偏见是那样溢于言表，上海人又是那样坦率地直认不讳，这对于在上海的西方观察家和历史学家多半是觉察不到的。他们更关注以阶级差别和性别差异为基础的平等和对抗而忽视那些由籍贯所界定的不平等和对抗。<sup>①</sup>而且，在上海这座移民城市里，籍贯构筑了社会等级结构，形成了傲慢与偏见的流行意识。本书不仅旨在分析一个移民群体即苏北人的历史经验，而且更重要的是，要揭示身份、偏见和社会矛盾的根由，这些是中国城市居民的核心问题，在中国条件下可能建构族群。

苏北人在上海的经历直接使人想起同那些族群身份很少受到怀疑的集团作跨文化比较。乍看起来，苏北人的贫困和对苏北人的偏见似乎很像美国的少数族群如非洲裔美国人、奇卡诺、波多黎各人和亚裔美国人的经历。然而，苏北人同这些族群不同，他们在形体上同其他上海人没有什么区别，他们几乎全是汉族人。尽管精英集团可以对待苏北人如不同种族，但事实上只有方言才能把他们区别开。

移居美国的白人移民，例如 19 世纪早期因马铃薯荒而逃荒的爱尔兰人可以用作较接近的类比，在新英格兰的城市中，如同在伦敦、曼彻斯特和利物浦等英国城市中一样，爱尔兰移民生活在单独的街区里，他们被人瞧不起，从事本地人不愿为之的营生。<sup>②</sup>爱尔兰人虽然同苏北人一样有着以移民为基础的身份，但又是一个在很大程度上以国籍界定的族群：他们来自一个国家，其文化传统和历史无可否认地不同于他们新家园的文化传统和历史。而且，要确定谁是爱尔兰人不成问题很简单，爱尔兰人就是来自爱尔兰的人。

苏北人就不是这样。他们不是跨越国界而来的移民，苏北也不是一个有着一目了然或能直截了当定义的地方。苏北这个名称既不是指一个城市、专区，也不是指一个省份，而是指一个地区，其区界和内核是争议未定的。因此，同美国的以种族或原国籍界定的族群集团有所不同，苏北人的经历类似于那些由地区差别界定的族群，如阿巴拉契山脉的“山区人”；他们定

居在北方的城市里,又如移居加利福尼亚的西南部“俄克佬”<sup>\*</sup>。

至少从表面上看,满可以把苏北人称为上海的俄克佬。同苏北人一样,俄克佬也来自这样的地区,其地区内聚力仅仅是为了应对来自其他地区的移民才形成的。这个地区并非依俄克拉荷马这个州名所表示的州界来划定的,而是包括了得克萨斯、阿肯色和密苏里诸州的部分地区。在 20 世纪 30 年代有名的干旱沙暴地区移民即他们的成千上万的老乡在加利福尼亚的中央谷重新落户之前,谁也想像不到这 4 个州竟建构了一个地区。作为移民,他们完成了加利福尼亚本地人不愿干而以往由墨西哥移民来完成的农业生产任务。尽管俄克佬同本地人一样都是白人,但被当作“卑微和异化的社会集团”来对待。称某人为俄克佬,就像称某人为江北佬(老江北)一样,成为一种流行的贬义措辞,意谓落后、贫穷、低劣。最后,尽管俄克佬是一个公认的加利福尼亚族群集团,但俄克族群最初不是由移民自己建构的身份,而是他们同加利福尼亚本地人发生关系的产物。<sup>③</sup> 同样,苏北族群不是基于传统,而是在上海被建构的。

尽管加利福尼亚的俄克佬同上海的苏北人之间有着种种相似之处,但这种类比仍是不完善的。据历史学家詹姆斯·格雷戈里说,俄克佬身份是同阶级相联系的。俄克佬这个名称本质上是指下层阶级的一个隐喻。来自俄克拉荷马和西南部其他州份的移民在洛杉矶和旧金山,甚至在中央谷找到了体面的工作,他们并未被人瞧不起或被斥为俄克佬。格雷戈里告诉我们,俄克佬这个陈年旧称“从来不是意指所有西南部人的”。

中产阶级的新成员几乎没有遭到怨恨或不尊重。即使是在反移民运动的当口上,大多数人还是得到了同经济地位与之相仿的其他白人一样的基本尊重。俄克佬这个陈年旧称首先不是一个地区偏见问题……阶级是根本的划分线。俄克佬的外人集团包括了非西南部的人,而社会身份体面的自己人集团则吸收了某些西南部人。<sup>④</sup>

一个人的原籍远不如他或她的职业重要;地区差别之所以显眼,只是为了将穷苦白人同富裕白人区分开来。

然而在上海,阶层同籍贯之间的关系要复杂得多。一方面,江南人与苏北人之间的区别在很大程度上是以阶层差别为基础的。苏北人这种称呼明

\* “俄克佬”(Okies),来自俄克拉荷马等州的人,故名。——译者注

显是意指下层人的一个隐喻,该名词系指贫穷受侮辱的人。在上海,阶层是由籍贯来建构的,籍贯的建构是阶层话语的组成部分。而且,正是因为这类身份同阶层难分难解地联系在一起,因而籍贯就具有族群涵义。

另一方面,苏北人这一社会类别的建构并不是严格的阶层现象;一个人的原籍的重要性绝不亚于这个人的职业。一些苏北人试图隐瞒其出身,但他们的身份不可能因阶层流动性而超越。20世纪40年代土改逃亡的富豪地主可能像‘苏北人’一样被人瞧不起,逃荒的穷苦农民也是。换句话说,最要紧的事情不止是阶层。族群性与阶层分野多半交相叠合,族群性强化了阶层分野,但族群不可归结为阶层。

要弄清什么东西在上海最最要紧,必须比照中国的情况加以考量,只有某些中国人被称为族群。实际上,在中国最通常称之为族群的那些集团在理解上也许同上海苏北人的经历最不相干。中国的族群研究经常聚焦于少数民族、非汉民族,如苗族、彝族、维吾尔族、蒙古族、藏族。尽管近期许多研究表明,界定这些少数民族的族群身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sup>⑤</sup>但他们同汉族的种族和文化区分则是无可争议的。大多数少数民族生活在边陲地区,因而不是内陆省份和沿海省份族群概念的主要面。换句话说,如果说在全中国族群式关系的发展取决于非汉少数民族的存在,那就找不到什么族群,或者说根本就没有族群。本书研究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要揭示族群身份是怎样在汉族本身的人群中得以建构的。

形形色色的中国人群与其说像少数民族不如说更似苏北人,这些人群至少在清代大部分时期里被认为是落魄失意、受人歧视的。诸如浙江的‘堕民’;山西和陕西的‘乐户’;广东的‘船民’一类的群体都沦为完全不同于且低于其余汉族人的地位。他们不得应科举,入另册以别于‘良民’,其妇女不许缠脚以抬高地位。<sup>⑥</sup>同上海的苏北人一样,这些集团的成员全是汉人,但他们的落魄地位严格地按职业而定。

同苏北人更为相似的是遍布中国各地的形形色色不计其数的移民群体,这些群体的成员也都是汉人。最明显的比照是中国东南部的客家人(北方官话,即‘客民’之意)。同苏北人相仿,客家人是一群移民,有别于本地人,主要以方言相区别。他们也像苏北人那样成为偏见的对象,说他们穷,是没有教化的乡巴佬,不文明。然而,同上海的苏北人正好相反,客家人并没有一致的原籍:他们的祖先据说在公元四世纪迁离河南,虽然他们大多数是唐代福建移民的后裔。中国东南部某些地区几乎成为清一色的客家社

会。<sup>⑦</sup>客家人自认为不同于他们那些讲粤语的邻居；他们把自己看作宋代官宦的后裔，相反，讲粤语的本地人则据称是土著蛮人的后裔。<sup>⑧</sup>

中国其他地区的移民就不如客家人明显了。例如，明清之际来自福建和粤北的移民定居在江西的山麓地区。尽管这些移民特性殊异，但本地人认为他们全是清一色同类流民或客民，用这贬义称谓称呼他们。本地人对这些流民的敌对情绪基于他们相对贫困以及方言和文化习俗之不同。<sup>⑨</sup>江西当地人在清代也迁移了。大批江西人定居湖南时，他们与湖南本地人之间的冲突日甚一日。为了把自己同卑微的江西移民区别开，湖南人认为这些移民是非汉族的部落人，虽然这些所谓的蛮人逐渐主导蓬勃发展的商业，从而最终在经济上压倒了本地人。<sup>⑩</sup>问题不在于江西的流民或在湖南的江西蛮人是否天生是族群，这个问题不是研究他们的学者提出的。相反，这两个个案揭示了上海苏北人的经历是怎样成为全中国范围内移民与本地人之间对抗性关系这个更大范围历史的一部分的。<sup>⑪</sup>

中国境内的移民产生了籍贯概念。中国人历来总是把他们的出生地同他们的籍贯区分开，籍贯系指他们祖上的故土。对于正式文档来说，以及就识别自己与他人而言，原籍至少同他的出生地一样重要。顾德曼在她关于上海同乡会组织和意识的研究中指出：“原籍概念是传统中国个人身份必不可少的组成成分。一般说来，[这]是陌生人之间相互打听的第一件事，是记录一个人(姓名和化名之后)的第一个特征，是个人涉讼前要被查明的第一个事实。”<sup>⑫</sup>

然而，籍贯是一种有伸缩性的建构：个人可以决定哪一代人的故乡作为他或她的原籍，而且，原籍可以指特定的村、区、市或省份。正因为原籍对一个人的身份十分重要，因此，要说明一个人的原籍殊非易事。

历史学家和人类学家早已认识到籍贯对于中国人的自我和群体观念十分重要。何炳棣的行帮研究是第一篇唤起人们注意原籍在中国的重要性的作品；籍贯和同乡关系在施坚雅的社会流动战略研究中有所暗示：地方性怎样培育人的具体本领而后传输到中国各地——山西钱庄老板、宁波商人，等等。<sup>⑬</sup>同样，苏珊·曼分析了上海的宁波人如何得以凭借同乡关系建立起强大的社群。<sup>⑭</sup>詹姆斯·科尔也记述了离开故乡的绍兴人依靠同乡关系的历史。<sup>⑮</sup>稍后，苏珊·纳昆和伊芙琳·罗斯基在她俩的有关 19 世纪中国历史的著作中指出：“同乡是离开故园到异乡客地从业的人们相依相助时作为根本手段最经常提及的。”<sup>⑯</sup>尽管同乡关系的作用在戴维·斯特兰德关于北

京的研究不算突出,但他描述了以同乡为基础的工人之间的派别,指明了同乡联谊在 20 世纪 20 年代继续发挥的重要作用,并揭示了同乡关系如何有时在城市政治中提供权力的基础。<sup>①⑦</sup>

有关城市条件下同乡关系的最广泛详尽的分析是罗威廉关于华中通商口岸汉口的极其翔实的研究。尽管他断言“该城市盛行的心态是世界主义的”,<sup>①⑧</sup>但还是强调城市发展中籍贯认同的持久性。罗氏描述了同乡关系在就业、寻求经济帮助和日常街头吵架时帮腔护驾方面的重要性。经商结帮、员工招聘和闲暇活动经常围绕同乡关系来组织;居住也反映了地方主义的持久性:汉口有些街区以特定同乡人为主,因而很像族群飞地。尽管出现了新的城市制度,同乡会在汉口居民的社会和政治生活中仍起一定的核心作用。籍贯的突出作用导致罗氏得出结论:“地理决定的亚族群划分……建构了晚清时期区分中国个人的最重要特征。”<sup>①⑨</sup>

尽管认识到籍贯在界定社会关系方面的重要性,但罗氏的研究和其他学者都按其字面意义看问题。他们并没有探讨籍贯怎样同阶级和文化盘根错节,怎样体现比地名本身更为全面、更加变幻不定的含义。指认一个人是宁波人或山西人,其含义是不成问题的,或者可以理解为社会建构的产物。

分析籍贯在中国的含意的更有生气的方法是近期有关非中国背景中族群的人类学研究。尽管对从何时起籍贯成为“族群”身份的问题没有提供明确的答案,但这些研究提出了思考社会集团的方法,这些方法若应用于中国,那就意味着对籍贯的分析要比以往研究中提出的方法复杂得多。西尔维亚·柳崎顺子关于西雅图日裔美国人的研究,卡伦·布卢的北卡罗来纳伦比族印第安人研究,以及詹姆斯·克利福德的科德角土著美国人研究,全都推动我们不要盯着字面意义上的身份而要去探索象征性的、社会建构的身份。<sup>②⑩</sup>新的学术研究成果主张不要把族群理解为单个身份,而要理解为一种社会关系体系。这就是说,身份只是在特定地方背景和历史背景下同其他身份的关系与区别中形成的。

然而,族群不仅仅是一系列的社会关系。新的研究成果还突出地表明族群是一个历史过程。新的研究成果不把任何特定地方的居民所标明的社会类别——非洲裔美国人、爱尔兰人、俄克佬、苏北人——看作是一种给定,相反,它鞭策我们去探索这些类别被建构的过程和它们的含义变化的过程。这些学者并没有把“共同传统”或“人丁共同身份感”这些通常在族群定义中援引的术语当作移民带到新家园来的一成不变的信念,相反,他们争辩

说,我们应当把这些术语看作是由于移民的结果而建构的理念乃至神话。正如威廉·杨西·尤金·埃里克森和理查德·N. 朱利安尼在他们的有影响的文章‘新兴族群’里所断言:“认为共同传统是族群的本质这一假设是错误的。族群也许相对来说同欧洲、亚洲或非洲没有多大关系,但同这个国家里的生存的迫切需要和机遇结构很有关系。”<sup>②①</sup>

因此,问题不在于要确定中国的籍贯何时通过族群的定性试验。相反,如果我们认为籍贯也许是族群,那么,我们就可以通过突显以往未能识别的社会关系和历史过程的方法去审视它。我们也可以把籍贯看作是不断地处在被建构和被赋予新含义的过程之中,从而以全新的方法去理解中国城市史中的社会、经济和文化诸方面。籍贯与阶层概念的关系、籍贯同城市文化的竞争领域的关系便豁然开朗了。

读者也许很想弄明白,族群究竟是什么意思?很少有什么题目像这个问题那样让人类学家争得不可开交,若不熟悉这场辩论就下定义,那是莽撞的。<sup>②②</sup>此外,尽管本书利用了有关族群的辩论,但也想探讨一种形态的族群——由原籍同乡界定的族群,这种族群在很大程度上未引起重视,本书欲以此来促进这些辩论。因此,本书的宗旨之一——通过探讨一种缺乏我们最熟悉的族群标志如种族和国籍的线索的情境——是要激励读者以新的思路去思考族群问题。

有关族群之含义的某些见解也许还是有启发的。第一,族群不是诸如血缘之类的客观事物,而是一种过程。更具体地说,它涉及到建构、援引和玩味文化独特性概念,以便在共同的政治经济体系内将人与人之间划分己类与另类。语言、种族、宗教、历史经验和原籍构成了属性金字塔,也许可以利用这些属性来建构这种‘己类/另类’的界限。但是,必须强调指出,构成不同的或者独特的语言、种族、历史或原籍的要素全是有伸缩性的。没有哪一个特征天生就是族群的标志。人类学家李·德拉蒙德指出:“某个特定属性,例如体貌、衣着、讲话、生活方式或宗教,只有凭借体现它的内涵体系才具有族群意义或标志意义。”<sup>②③</sup>

这导致有关族群含义的第二种见解:没有哪一个人群天生地或不可改变地是族群。例如,爱尔兰人在爱尔兰就不是族群,只有在他们移居美国后才成为族群。非洲裔美国人和整个美国历史上被视为族群的几乎每一个其他人群集团也是如此。同样地,苏北人不是在苏北的人,只是在上海才成为苏北人。换句话说,族群取决于族境。

关于族群含义的第三种见解涉及到谁来界定社会类别。人类学家鲁思·蒙德尔指出,族群身份大概是谋求以“集体团结集团”自诩的人说出来的。表明这种团结是为了抵御污辱或歧视,要求政治经济权利,以集团的传统而自豪。然而,蒙德尔正确地坚持说:“被划分”感也许正是“外在决定的,例如,旨在从属和统治。”<sup>②4</sup>正是这后一种现象主导着上海苏北族群的建构。

关于族群含义的第四种见解涉及族群同阶层的关系。尽管一个社会可以由阶层而不是由族群来建构,反之亦然,但在许多情况下,这二者似乎是交叉的,或者甚至是代表同一人群的不同名称。尽管阶层和族群的根子都是不平等结构,但阶层是根据一个人在生产过程中的地位来界定的,而族群是以基于原籍的差别来界定的。二者中任何一个都不能归结为另一个,但二者往往重叠,就像有关族群差异的信念即使不是被建构也是经常被用来解释或文饰职业上的等级结构。

我在本书里既小心翼翼又深思熟虑地使用族群这个术语。我小心地使用这个术语是因为族群这个概念在中国并不存在。这个词在中国经常被译成民族。民族一词的字面意义系指“族籍”,或“少数民族”(仅指非汉族人)。<sup>②5</sup>我所撰写的这个主体在中文里没有称谓。而且,就连西方人类学家们也很少把它引伸到包括地区身份,即大不同于民族、种族、宗教或部落身份的身份。但我使用族群这个术语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因为没有别的术语可以哪怕是大致充分地描述苏北人这个类别在上海历史上的功能。简单地指涉籍贯就模糊了社会建构过程及其所涉及的统治与从属关系。

许多学者用亚族群和准族群这两个术语来描述中国的以原籍为基础的社会集团。<sup>②6</sup>然而,说上海的籍贯为亚族群是成问题的,因为那就意味着存在某种更显赫、大概也更正式的族群类型,而籍贯则是从属的。正如帕梅拉·克罗斯利所说:

也许在描述汉族内部的族群时已经约定俗成的“亚族群”术语中,我们还要注意到另一种汉学遗产。这就是,汉族只有一种可采用的“语言”——中国的语言在汉学习语中成了“方言”——所以他们只能是一个“民族”;这个民族内部的变种就不是“族群”,而是“亚族群”。当然,“族群”的更广泛含义方便地涵盖了人与人之间的文化多样性,一个层次上的人全都认为自己是汉族人,而在另一个层次上的人则显示了可



## 认知的族群意识。<sup>⑦</sup>

把族群这个术语归之于由原籍所界定的集团的做法其实在中国学研究中是有先例可循的。施坚雅在他的清代中国城市制度的分析中第一个提出了这种做法的适用性。他建议“在晚清城市里盛行的原籍同乡经济专业化模式”

可以按族群分工来分析，这样做大有裨益。把中国城市里的外地商人的“殖民地”看作少数族群没有任何困难。……重庆的安徽商人，北京的宁波商人，汉口的孝感商人，广州的宁波商人，福州的山西商人——全都讲当地人难以听懂的语言，他们的习惯从最好的方面来说也显得稀奇古怪。但是，如果说近期的族群研究对我们有什么教益的话，那就是，族群的固定性绝不是单单基于文化差别、口音的些微差别乃至习气的小有不同，只要认为有利于保持或竖立族群界线，二者便都可以成为族群的标志。<sup>⑧</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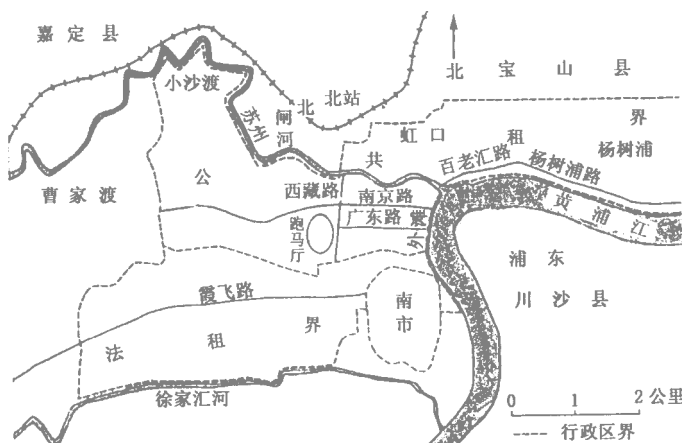
这种分析已被应用于若干个案研究中，不过多少是有限地应用。例如，戴维·奥恩比和斯蒂万·哈勒尔两人都说晚清从中国东南部各地移居台湾的移民之间的分野就是族群分野。<sup>⑨</sup> 希尔·盖茨分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几十年间大陆人与台湾本地人之间的关系变成族群关系的过程。<sup>⑩</sup> 最后，C. 弗雷德·布莱克分析了香港新界的一个集镇的社会结构，他坚持用族群这个术语来描述很大程度上由原籍来界定的群体身份。<sup>⑪</sup> 我的苏北人研究借重了这些著作，在地理上扩大了以往局限于台湾研究和香港研究的那种思想框架。<sup>⑫</sup>

这就把我们带回到上海，因为本书不是泛泛地谈论籍贯，而是探讨一个特定类别。本书也不是泛泛地谈论苏北人，而是探讨他们在上海的特殊经历。（其实，苏北人这个类别在上海和江南以外的地方并不存在——来自上海人称为苏北的人若生活在北京、汉口一类的城市里则并不被认为是苏北人。）本书探索原籍的含义，但也探讨上海历史的进程。

当诸如苏北人那样的特定原籍同乡类别成为研究的焦点时，我们看到，在上海，社会和经济关系是怎样在很大程度上由原籍来界定的。对此根本不应感到吃惊，因为 1949 年以前的上海是一座移民城市。1907 年的上海地方志的作者们指出“上海是一块混合杂居地，来自全中国各地的人们杂居于此。外地人的数量超过了本地人。”<sup>⑬</sup> 统计数字证实了这种印象：

1885 年,移民约占该市人口的 85%;1930 年,占 78%(这是空前下降的最低数字);1949 年占 84.9%。<sup>④</sup>

原籍构成了上海主要的社会和经济画面。各色外侨的飞地——显然就是法、英、俄、日侨的居住区——成横列与来自中国特定地区的移民街区毗邻。例如,宁波人集中在法租界和黄浦江畔南市北区;广东人主要定居在虹口区或广东路沿线靠近大船坞,许多人受雇于此;苏北人大多数见诸外国租界边沿的棚户区<sup>⑤</sup>(参见地图 1)。



地图 1 1919 年的上海

从 19 世纪中叶起,该市作为一个商业和工业都市开始发展起来,上海的劳工、商人和中小企业主大多数来自三个地区:广东、江南(浙江的宁波—绍兴地区和江苏的无锡—常州地区)和江苏北部(谓之苏北)。一个人来自上述哪个地区对其就业机会、居住格局、文化活动和社会地位的影响至关重要。等级结构多半是按原籍建构的:精英集团主要由来自广东和江南的人组成,非技术性的服务行业则主要由来自苏北的移民充任。即使并非所有来自宁波的移民都富,亦非所有来自苏北的移民都穷,但毋庸置疑,宁波人身份意味着富有和温文尔雅,而苏北人身份则与贫穷无知相联系。

社会冲突也往往以不同籍贯人群之间的对抗为基础。以往的研究业已指出了 19 世纪中期广东人和宁波人之间明火执仗的争衡。<sup>⑥</sup>但苏北人和江南人之间的冲突是 19 世纪晚期以来上海最最突出的两个不同籍贯族群的分隔,这一点在很大程度上一直受到漠视。而且上海的经济、社会、文化史,有时乃至政治史,在不小程度上是这个冲突在殖民地背景下的产物。要理

解上海这个移民城市里社会组织以及阶层与籍贯之间的关系，就要分析这两个最大移民集团之间的矛盾。

上海社会类别的建构和命名也反映了籍贯的中心地位。鉴于上海的移民人口众多，因此毫不奇怪，原籍界定了某些主要的社会集团（上海帮、宁波帮和苏北帮），这同美国经常以原国籍来界定个人和族群集团极为相似。但是，如上所述，怎样界定一个人的原籍并不总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一个来自中国的美国人可谓华裔美国人或亚裔美国人；来自墨西哥的美国人可谓墨西哥裔美国人、奇卡诺或拉美裔美国人。对这些称谓选择上的冲突，即少数族群集团如何界定自己与精英集团如何界定他们这二者之间的对立，证明了以下事实：要害不仅仅是称谓本身。来自江苏北部的人通常不接受江南精英集团强加的苏北称谓就暗示了充斥于上海历史上的类似冲突。

最后，聚焦于苏北人迫使我们以新的思路去理解上海人和上海文化。要以上海人和上海文化自居是要经受严峻挑战的。江南移民为声称上海人就是他们自己而作的斗争在很大程度上借助于这样一种信念，即认为存在着一个受人鄙视的苏北人集团——在上海发展成为现代工业中心的整个过程中，这一信念一直处于重要地位。只有对照它界定自我时作为反衬的另类才能理解上海人身份，苏北人就代表那个另类。<sup>\*</sup>

尽管苏北人的经历清楚地显示了上海历史的以往看不见的方方面面，上海发展的某些侧面仍是分析苏北人这个社会类别形成的主要途径。移民组成的人口百分比早已一目了然。同样重要的是上海作为通商口岸的地位，不过由于种种原因而未立显昭昭。从 1842 年鸦片战争结束时签订南京条约起，外国商人和传教士蜂拥而至上海。到 20 世纪早期，原中国老城在地理上处于由英、美租界合并而成的公共租界和法租界的边缘。

因此，据称苏北人的贫困落后不只是以中国精英集团的标准来衡量，而且还用外国的标准来衡量。沿黄浦江码头的英式建筑大楼和‘法国城’的别墅凸显了苏北人居住的棚户区的破烂不堪。欧洲服饰彰显了苏北人衣着的破旧褴褛。首批从国外进口的有轨电车和汽车使许多苏北人拉的黄包车更显落后。

外国对上海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统治也以其他方式影响了苏北人这一

<sup>\*</sup> 这里作者把江南人和苏北人的区别称为江南精英集团和苏北人集团，显然是一种有失偏颇的观点。——译者注

类别的建构。第一,上海外国工业的发展对江苏农村经济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它加剧了该省以长江为界的分隔,从而江苏南北逐渐分别代表富与穷。倘若上海不是通商口岸,那就很可能没有一个叫作苏北的地方。第二,外国投资构筑了上海的劳动力市场,致使某些职业由于属于现代产业而被界定为地位高的职业,所谓现代则多半是外国人界定的。地位低的职业是同苏北人相联系的职业,这一点必须联系到外国控制下的经济才能理解。最后,在建构苏北人这个类别上起了至关重要作用的江南精英集团自身是处于从属地位的。它以上海人自居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它同外国人的联系——即使只是一种模仿的企望——来界定的。与之相反,苏北人之所以落后是因为他们不懂得西洋方式。

殖民主义为苏北人类别的发展提供了更大的背景。外国人有时成为建构这个类别的活性媒介。整个 20 世纪前半期,外国控制下的上海市政当局不断努力消灭苏北人居住的棚户区,减少苏北人拉的黄包车的庞大数量。正是外国人强加了关于现代城市应为何物和苏北人被认为是这一理想中的一个瑕疵的信念。

因此,苏北人的历史不仅是上海穷困潦倒的下等人的历史,而且也是中国主要通商口岸城市化、移民和工业化的过程、结果和体现自身含义的历史。它验证了我们如何运用人类学的族群理论以崭新思路理解一个特定移民群体的经历,此外又认识到以往视而不见的上海不平等和偏见的种种形态。

有关苏北人的书面材料少而又少。苏北人同知识分子、农民、妇女乃至工厂工人不同,人们很少承认他们是一个独特的社会集团,因此从来不是观察、调查和报告的对象。此外,尽管他们的有些职业,如拉黄包车,经常有人调查过,但其他许多职业,如在理发店和澡堂的差使、拉粪车、卖菜,却很少有人去写。就连人口普查都不把上海的苏北人计算在内,致使人们无法知道任何给定时期他们构成人口的确切百分比。

1949 年以前有关上海社会状况的数千种书籍和期刊文章中,只有两三百种聚焦于苏北人的经历。同大多数非精英集团一样,苏北人写他们自己的东西少而又少。最后,就连那些提供零星提到苏北人的资料(正是这类零星碎片的几千份资料形成了本书的核心)的人也是成问题的,因为他们决不认为鉴定一个人的苏北身份有什么可争议的。

尽管有这些局限,上海苏北人的史略还是可以辑成的,虽然也许不完整。必须在字里行间寻觅苏北人:在有关棚户居民、帮会组织和工人的研究作品中,在旅行指南、语言学概览和有关地方剧种的宣传材料中去寻觅。也许在地方报纸上最容易找到他们,1949 年以前,这些地方报纸一律具体指明所报道人物的原籍。可以接触到的工厂档案和代表江苏北部各地区的同乡会档案提供了十分宝贵的资料。

然而,若无口述史访谈,本书是不可能写成的。我在 1986 年和 1988 年间对大量的上海苏北人进行正式采访,主要是为了印证他们的从业经历。然而,漫不经心的评述乃至人们的行为方式同他们提供的信息资料一样富有启发性,一样重要。例如,上海某淮剧团的成员们一听说在他们到苏北各地作为期两个月的巡回演出时一位外国学者要随团前往便大喜过望。我的随团前往使他们原来的沉闷的出行变得津津有味起来——原本之所以沉闷是因为苏北的住宿条件和食品供应远远比不上他们在上海习以为常的水平。虽然巡回演出是必要的,因为上海的观众面不足以供养他们。他们以前从未想象过一个外国人会对他们感兴趣,也乐于有机会打听美国的地位同他们在上海差不多的演出团体。同样地,一群来自苏北的环卫部门工人也很高兴一位外国学者对他们感兴趣,他们欢迎我到他们在工作单位去,除了在他们自信尊重他们的单位里沏上一杯比较普通的粗茶水以外,还端出大盘大盘的水果、瓜子和糖果。一位来自扬州的澡堂修脚工前来接受采访时穿着西装,同来的一位来自盐城的工人同伴却穿着较为普通的工装;他以此衬托出他的态度:虽然他们都来自苏北,扬州人却文雅老到得多。许多次原先作为正式采访的会议变成了被采访者之间就对待上海苏北人歧视的性质和原委展开的激烈争论。这些自发辩论反映出来的怒气和义愤,较之他们对我关于他们来自苏北意味着什么的正式提问的回答更能说明他们的态度。

在探索对苏北人的今昔态度方面,随意的交谈同正式访谈一样重要。由于同 1949 年以后的工人阶级或少数民族的地位不同,苏北人的地位从来不是一个政治问题,因此,没有任何敏感、难堪或羞耻心去检点人们的贬抑性评论。例如,只要一提到我的研究话题,就势必引起有关苏北人性格缺点的热烈谈论。即使就与苏北人无关的话题交谈也有可能引出表明流行态度的评述。一位朋友向我讲述了她大学里的一位教师的故事。这位教师据说陷入了婚外情,她说:“当然啰,他是苏北来的。”她不知道我对苏北人怀有特

别的兴趣。

通过随意交谈、采访和文件资料收集苏北人作为一个移民群体的已知历史,我的目的是要分析上海最有害的偏见和歧视的根源。更为广义地说,我探讨原籍与社会等级结构之间的关系以及这种关系对中国城市化的过程与含义的影响。最后,我之所以强调基于苏北一类籍贯的社会类别的建构和含义,是希望提出建构中国历史上族群学的新思路。每个族群都有一部历史,只有从它的原籍诸方面去寻迹那段历史才能加以理解。归根结蒂,这就是本书想要贡献于读者的。

- ① 参阅理查德·克劳斯:《中国社会主义条件下的阶级冲突》,纽约 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 1981 年版 林恩·怀特第三:《致乱的政策 中国‘文化革命’中暴力的组织根源》,普林斯顿 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 1989 年版 德博拉·戴维斯-弗里德曼:《代际不平等与中国革命》,《现代中国》1983 年 4 月号,第 177~201 页。
- ② 奥斯卡·汉德林:《波士顿的移民》,纽约 文学协会 1972 年版。
- ③ 关于俄克佬的精辟历史分析,参见詹姆斯·格雷戈里:《美国的〈出埃及记〉 干旱尘暴地区移民和加利福尼亚的俄克佬文化》,纽约 牛津大学出版社 1989 年版。
- ④ 格雷戈里前揭书,第 102~103 页。
- ⑤ 参阅德鲁·C. 格拉德尼:《中国穆斯林 人民共和国的族群民族主义》,坎布里奇: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会 1991 年版 斯蒂范·哈勒尔:《族群、地方利益集团和国家 中国西南部的彝族社区》,《社会与历史比较研究》第 32 期(1980),第 515~548 页。帕梅拉·克罗斯利的满族研究提供了有关种族身份何以是一种社会建构而不是“真实事物本身”的精辟分析。参见克罗斯利:《孤儿战士 满族三代人与清朝的结束》,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 1990 年版。
- ⑥ 詹姆斯·H. 科尔:《传统中国的社会歧视 绍兴堕民》,《东方经济与社会史杂志》第 25 卷第 1 期(1982 年 2 月),第 100~101 页。
- ⑦ 迈伦·L. 科恩:《客家人或‘客民’作为中国东南部社会文化变量的方言》,《族群史》第 15 卷第 3 期(1968),第 243~248 页 另参见 C. 弗雷德·布莱克:《族群集团与中国集镇中的社会变迁》,檀香山:夏威夷大学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8~10、49~50 页。
- ⑧ 布莱克前揭书,第 1~2 页。
- ⑨ 斯蒂芬·C. 艾夫里尔:《流民与江西山麓地区的开垦》,《现代中国》第 9 卷第 1 期(1983 年 1 月),第 84~126 页。

- ⑩ 彼得·帕杜：《耗竭地力 国家与湖南农民，1500—1850》，坎布里奇 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会 1987 年版，第 97~112 页。
- ⑪ C. 弗雷德·布莱克关于广东集镇族群的研究强调了“本地人”/“移民”身份的意义。见布莱克前揭书，第 12 页。
- ⑫ 顾德曼：《原籍与城市：上海的移民意识和移民组织，1853—1927》，博士论文，斯坦福大学，1990 年，第 4 页。
- ⑬ 何炳棣：《长江中上游诸省会馆的地理分布》，《清华中国研究学报》第 5 期（1966），第 120~152 页 施坚雅：《晚清中国境内的社会流动统计》，收录在卡罗尔·A. 史密斯编：《地区分析》，第 327~364 页，纽约，1976 年版。
- ⑭ 苏珊·曼·琼斯：《宁波帮与上海金融权力》，收录在伊懋可和施坚雅编：《两个世界之间的中国城市》，第 73~96 页，斯坦福 斯坦福大学出版社 1976 年版。
- ⑮ 詹姆斯·H. 科尔：《绍兴：19 世纪中国国内的竞争与合作》，图森 亚利桑那大学出版社 1986 年版。
- ⑯ 苏珊·纳昆和伊芙琳·罗斯基：《18 世纪中国社会》，纽黑文 耶鲁大学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47 页。
- ⑰ 戴维·斯特兰德：《北京人力车：20 世纪 20 年代的城里人与政治》，伯克利 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 1989 年版。
- ⑱ 罗威廉：《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商业与社会，1796—1889》（以下简称《汉口 商业与社会》），斯坦福 斯坦福大学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247 页。
- ⑲ 同上书，第 213~251、259~267 页。另参阅罗氏：《汉口：一个中国城市里的冲突与共同性，1796—1895》，斯坦福：斯坦福大学出版社 1989 年版有关原籍之作用的讨论。
- ⑳ 西尔维亚·柳崎顺子：《改变历史 日裔美国人中的传统与亲缘关系》，斯坦福 斯坦福大学出版社 1985 年版 卡伦·布卢：《伦比族印第安人问题：一支美国印第安族的形成》，纽约 剑桥大学出版社 1980 年版 詹姆斯·克利福德：《文化的困境：20 世纪的人类学文学与艺术》，坎布里奇 哈佛大学出版社 1988 年版，尤见“马什比族人的认同”一章，第 277~346 页。
- ㉑ 威廉·杨西·尤金·埃里克森和理查德·朱利安尼：《新兴族群 重新探讨与重新阐释》，《美国社会学评论》第 41 卷第 3 期（1976 年 6 月），第 391~402 页。引文见第 400 页，第一批拒绝“共同传统”是族群的基础之说者之一是弗雷德里克·巴思。“导论”，见巴思编：《族群集团与族界》，第 9~18 页，波士顿 利特尔，布朗公司 1969 年版。
- ㉒ 对人类学家使用族群一词的分析，参见沃纳·索洛尔斯：《超越族群 美国文化中的同见与歧见》，纽约 牛津大学出版社 1986 年版，尤见第 20~29 页。另参阅布卢前揭书第 200~235 页。

- ②③ 李·德拉蒙德：《文化连续统体系际理论》，《人》第 15 卷第 2 期（1980 年 6 月），第 352～374 页，引文见第 354 页。
- ②④ 鲁思·蒙德尔：《西柏林移民客籍工人中的族群与认同》，收录在南希·L. 冈萨雷斯和卡罗琳·S. 梅康芒编：《冲突、移民与族群的表达》，第 60～74 页，博尔德·韦斯特维尔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73 页。
- ②⑤ 费孝通：《走向一种人民的人类学》\*，北京 新世界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60～77 页。
- ②⑥ 例如，哈里·兰姆利：《清代的亚族群抗衡》，收录在埃米莉·马丁·艾亨和希尔·盖茨编：《台湾社会的人类学》，第 262～318 页 罗威廉：《汉口 商业与社会》，第 213～214、246～247 页。加里·汉密尔顿在他关于东南亚海外华人社群的研究中对于以籍贯界定的集团是称为族群还是亚族群举棋不定。汉密尔顿：《族群与地区主义 影响东南亚华人认同的若干因素》，《族群》第 4 期（1977），第 337～351 页，尤见第 338～341 页。
- ②⑦ 帕梅拉·凯尔· Crosstly：《关于近代中国早期族群的思考》，《晚清中国》第 11 卷第 1 期（1990 年 6 月），第 1～34 页，引文见第 15 页。斯蒂范·哈勒尔附和 Crosstly 对亚族群一词的批评，哈勒尔在讨论晚清台湾的族群认同时断言：“所谓的‘亚族群’活动与族群活动的方式如出一辙”；参见哈勒尔：《从械斗到义军，台湾北部族群的衰落，1885—1895》，《晚清中国》第 11 卷第 1 期（1990 年 6 月），第 99～127 页，引文见第 109 页。
- ②⑧ 施坚雅：《导论 清代中国的城市社会结构》，施坚雅编：《晚清中国的城市》，第 521～554 页，斯坦福 斯坦福大学出版社 1977 年版，引文见第 544 页。
- ②⑨ 参阅戴维·奥恩比：《清代台湾的族群世仇 这不是暴力事件又是什么？1782 年漳—泉械斗的一种解释》，《晚清中国》第 11 卷第 1 期（1990 年 6 月），第 75～98 页 哈勒尔：《从械斗到义军》。
- ③⑩ 盖茨：《族群与社会阶级》，收录在艾亨和盖茨编前揭书第 241～281 页。
- ③⑪ 参见布莱克前揭书。
- ③⑫ 正如德鲁·格拉德尼所指出：“布莱克关于新界汉族人中的族群集团的说法几乎没有招致什么争议，或许是因为该地是香港而不是中国大陆”；一旦香港回归中国，这些所谓的族群集团又会怎样呢？格拉德尼恰当地问道：“布莱克会不会因为将次地区认同与族群混为一谈而受到批评”？（格拉德尼前揭书，第 306～307 页）据推测这个问题同样适用于台湾的族群。
- ③⑬ 李维清：《上海乡土志》，上海 1907 年版，《上海滩与上海人丛书》重刊本，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108 页，该段引文始见于顾德曼前引博士论文第 1 页。
- ③⑭ 从 1885 年到 1935 年，上海籍人平均只占公共租界人口的 19%，占该市的中国区人

\* 原著系英文版。——译者注



口的 26%。邹依仁：《旧上海人口变迁的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0 年版，第 112～113 页。

③⑤ 梁元生：《19 世纪中期上海的地区争衡 广州人与宁波人之争》，《清史问题》第 4 卷第 8 期（1982 年 12 月），第 29～50 页，引用资料见第 30～31 页。

③⑥ 同上，第 29～50 页。